



鲁迅研究概要

广西教育出版社

俯首甘為孺子

0.97

I210.97
271
3

B425.100

鲁迅研究概要

刘泰隆 林志仪 雷锐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B 663620

鲁迅研究概要

刘泰隆 林志仪 雷锐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5.125印张 11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435—0705—6/G·582

定价：1.60元

前 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研究》是国家教委规定的高等教育中文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但是直至目前为止，全国尚未出版一本《鲁迅研究》教材，为了满足社会青年、各类高校学生和一般鲁迅著作爱好者自学的需要，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五省（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编写协作第二次会议指定由我们负责编写此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有关专家的鲁迅研究论著。全书共分十五章，由刘泰隆执笔编写第一、二、三、四、五、七、十四、十五章，林志仪执笔编写第十二、十三章，雷锐执笔编写第六、八、九、十、十一章。由于时间匆促，并限于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一定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点，恳切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于桂林广西师大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研究历史概况·····	(1)
第二章	鲁迅思想发展道路·····	(16)
第三章	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	(28)
第四章	鲁迅小说的典型创造·····	(40)
第五章	鲁迅小说的情节与结构·····	(48)
第六章	鲁迅小说的语言和风格·····	(59)
第七章	鲁迅小说的艺术辩证法·····	(69)
第八章	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	(78)
第九章	鲁迅小说的贡献·····	(87)
第十章	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	(97)
第十一章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106)
第十二章	鲁迅的散文和散文诗创作·····	(116)
第十三章	鲁迅的诗歌创作·····	(126)
第十四章	鲁迅与外国文学·····	(137)
第十五章	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	(148)

第一章 鲁迅研究历史概况

我国的鲁迅研究，如果从1913年恽铁樵对《怀旧》的评点算起，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傅斯年在1919年4月《新潮》发表评论《狂人日记》的文章《一段疯话》算起，也有六十多年了。六、七十年来，研究鲁迅的文章、专著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我们如何正确认识鲁迅研究走过的道路，正确评价过去研究文章和专著的得失，正确总结过去研究的经验教训和正确把握今后研究的方向，这对于一个有志于鲁迅研究的同志和关心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批评史的同志，都是非常值得了解的问题。因此，学习《鲁迅研究》课，首先必须了解鲁迅研究的历史。

一、鲁迅研究的六个时期

（一）鲁迅研究的草创时期（1913—1927）

鲁迅作品的反响和评论，最早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恽铁樵对小说《怀旧》所作的评点和“附志”。但这尚不能作为鲁迅研究历史的起点，因为鲁迅是以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为标志正式开始他的新文学事业的。

《狂人日记》的评论，最早是1919年2月出版的《新潮》上的《书报介绍》，认为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第一篇评论文章，是1919年4月《新潮》上发表傅斯年的《一段疯话》，认为人们应视“狂人”为老师，说“我们最当敬

从的是疯子，最当敬爱的是孩子，疯子是老师，孩子是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老师走，走向光明”。这对鲁迅创作意图的理解是颇深刻的。但在当时影响最大、可以说第一个为鲁迅赢得广大社会声誉的，是在1919年11月《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的吴虞。吴虞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并且吴虞本人是当时“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著名斗士。但吴虞的文章只是借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主题发挥自己反封建的思想，并不是正面的文学评论。第一个从文学的角度来评论鲁迅作品的是于1921年8月《小说月报》上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的郎损（即茅盾），第一篇对《呐喊》作出了正确而很高评价的文章是沈雁冰（茅盾）的《读〈呐喊〉》。后文发表于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上，肯定了鲁迅的小说是“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的现实主义佳作，紧接着我国文学界就出现了对《呐喊》不同意见的争鸣。1924年2月18日《创作季刊》上发表了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就是第一篇系统发表不同意见的鲁迅作品评论，错误地把《呐喊》中除《不周山》（后改题为《补天》）以外的作品均评为“自然主义的作品”。这一时期出现的第一篇“鲁迅论”是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发表于1925年1月24日和31日的《现代评论》。他说读《狂人日记》，“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明灯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他说鲁迅小说的特点“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虽有偏颇之处，但到底概括了鲁迅及其作品的一个基本特色，对理解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有意义的。本时期鲁迅研究的压卷之作，是1927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上方璧（茅盾）发表的《鲁迅论》，这篇论文对鲁迅

的小说、杂文及其为人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认为读鲁迅小说必须也读他的杂感集，才能完全明白他的用意；指出鲁迅著作的确是指引青年们“怎样生活着，怎样动作着的大方针”；同时也进一步分析了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和技巧。本时期出版了两本鲁迅研究的文集：一是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创作》（1926），一是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1927）。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二十年代的文坛基本上是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鲁迅的；但同时，陈源、高长虹等人却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不合实际的评论与卑劣的诬蔑——这是鲁迅研究领域进步与倒退两种观点对立与斗争的开始。这时期评论者多是把鲁迅单纯视为新文学家，对他创作的评介大多是感想式的；从观点上说，基本是使用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和模糊不清的现实主义（往往混同于自然主义）的文学观；从方法论上说，则形而上学和朴素辩证法等兼而有之。

（二）鲁迅研究的发展时期（1928—1936）

这一时期一开始，就遇到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他们把鲁迅当作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障碍进行攻击，发表的文章片面性又较大，这使鲁迅研究出现了暂时的逆转。但当时的文学史家们是承认鲁迅在学术界地位的，如1928年1月出版的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就认为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学作家“最著盛名的自然是鲁迅”。这年六月出版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高度评价了鲁迅文学史著述的功绩，提出：“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年五月在《长夜》第四期上发表的刘大杰《〈呐喊〉与〈彷徨〉与〈野草〉》指出：“在中国写实主义的作家里面，鲁迅是成功的一个”。尤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冯雪峰。他表现了清醒的马列主义观点，在1928年9月创造社、太阳社错误地

攻击鲁迅的高潮中发表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虽然对鲁迅的评价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但他力排众议，维护鲁迅，强调指出“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空隙，可以断言鲁迅是诋谤过革命的。”“在‘五四’、‘五卅’期间，智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1930年他又写了《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一文，这是鲁迅研究史上从文艺社会学的理论高度分析鲁迅作品社会效果的第一篇文章。1936年，他又写了《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指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又是“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

“左联”成立标志着鲁迅研究发展期的到来。突出的表现有：

第一，瞿秋白于1933年发表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了鲁迅杂文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作家的个人原因，充分肯定了鲁迅杂文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斗争史上的巨大价值，并深刻分析了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和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世界观转变，科学地概括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这篇论文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派的基石。

第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研究也有长足的发展，并出现了第一本鲁迅研究的专著——李长之的《鲁迅批判》，虽然观点、方法都有错误，但他持的学术研究态度，不能混同于这时期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诬蔑攻击和周作人等的歪曲。

第三，鲁迅研究的领域扩大了。如对《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以及《两地书》等，都有人发表了评论文章，鲁迅的翻译工作、鲁迅与外国作家的关系，也开始有人加以评论了。

这时期的鲁迅研究已经认识到鲁迅在中国革命和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奠下了科学研究鲁迅的基石，也开始提出了科学地研究鲁迅的方法论问题（如欧阳凡海1936年发表的《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鲁迅杂文开始被作为重点来研究了。虽然研究的基点政治敏感性很强，但是框框较少，讨论气氛浓。总的看来，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起步是健康的，发展是迅速的。

（三）鲁迅研究的开拓时期（1936—1949）

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鲁迅研究得到比较深入广泛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和伟大号召之下，鲁迅和鲁迅精神得到了全党和全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鲁迅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被誉为“民族魂”。鲁迅逝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等三个电报，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鲁迅逝世后，毛泽东发表的《论鲁迅》（1937）、《新民主主义论》（1940）、《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等，高度评价了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极大地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指导和推动了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

2. 研究领域的巨大开拓。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出现

了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1941），是马列主义鲁迅研究派的第一部专著。此外，还发表了许多著名的专论：周扬的《精神界的战士》（1941）、雪苇的《鲁迅先生思想的“转变”与概观》（1940）、艾思奇的《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1941）、何其芳的《论鲁迅的方向》（1946）、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1948），以及郭沫若的《庄子与鲁迅》、《鲁迅与王国维》、陈毅的《鲁迅与韬奋》、巴人的《鲁迅与高尔基》等，都多侧面、多层次地对鲁迅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见解颇为深刻。鲁迅著作研究方面，有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路沙编辑的《论〈阿Q正传〉》（收入九篇文章）；还有王任叔的《论鲁迅杂文》，可以说是第一本鲁迅研究杂文的专集。再有，象徐懋庸的《鲁迅的杂文》、巴人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吕荧的《鲁迅的艺术方法》等等，都是不乏深刻见解的论著。

3. 着手进行了鲁迅研究的基本建设。出版了《鲁迅全集》二十卷本（1938）、《鲁迅三十年集》（1941）、《鲁迅书简》。收集、出版了悼念鲁迅逝世活动的诗文和研究文集《鲁迅先生纪念集》。发表、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录，如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等。

这时期，还出版了王士菁的《鲁迅传》，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林辰的《鲁迅事迹考》，是第一本关于鲁迅的资料专集。此外，全面研究鲁迅的计划也有人提出来了。

4. 研究队伍和地域扩大了。鲁迅逝世前，研究鲁迅主要是上海、北京、广州的一些文艺工作者。鲁迅逝世后特别

是抗日战争以后，鲁迅研究由沿海扩展到内地、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香港和海外都有不少人研究鲁迅。

（四）鲁迅研究的丰收时期（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光辉论述更加深入人心，党和政府为鲁迅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鲁迅研究进入了全面的丰收时期。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培育扩大了研究队伍。全国除成立了不少专门研究机关设有专业研究人员以外，各文科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师和文艺理论教师的不少人都以鲁迅为主要研究方向，其他业余研究鲁迅的人也越来越多。

2、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表了鲁迅研究的论文四千余篇，出版了专门著作一百多本。

3、对鲁迅思想和创作开展了多方面的讨论和争鸣。如关于鲁迅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关于《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等都开展了讨论，把鲁迅研究推向纵深发展。

4、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鲁迅思想研究方面有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56）、李何林的《鲁迅五四时代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51）、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联系》（1956）以及冯雪峰《鲁迅与果戈理》、陈鸣树的《鲁迅与拜伦》等，对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鲁迅的思想与创作同中外文化遗产的关系，都做出了具有理论高度的论述。在创作方面，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何其芳的《论阿Q》等都有很大的突破。

此外，对鲁迅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想等等，也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但是这时期的鲁迅研究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问题，最主要的是政治上思想上“左”的干扰。早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就露出了苗头，如李长之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中，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检查了缺点，另一方面又给自己扣上了“艺术至上”、“缺乏党性、缺乏阶级观点、缺乏战斗性”种种帽子。以后随着1955年反胡风、1959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1960年以后“反修正主义”等运动的开展，除了每搞一次运动就打倒一批鲁迅研究专家、否定一批鲁迅研究历史遗产之外，鲁迅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倾向日益滋长，在鲁迅思想研究中出现了诸如人道主义思想、改造国民性主张、“立人”思想等许多禁区，在阿Q典型问题研究中，“本质论”（即认为农民的“本质”应该是勤劳的、善良的、乐观的、反抗的等等，而阿Q是农民，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不是农民阶级所具有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影响的结果）的观点广泛传播，给鲁迅研究带来障碍，使鲁迅研究产生了几次大的曲折。

（五）鲁迅研究的挫折时期（1966—1976）

由于解放以后，政治上思想上的“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到了“文革”十年，我们的党和国家便遭到严重的灾难，鲁迅研究也遭到严重的挫折。

早在1966年5月份，“四人帮”在《红旗》1966年第9期上就抛出了《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的黑文，从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6卷上有一条对鲁迅作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打开缺口，诬蔑我国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有一条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它的主帅就是周扬。以后的批判文章还诬蔑这条“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十七年。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

选集》序言》到李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以至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和朱正的《鲁迅传略》，等等，全被诬蔑为攻击鲁迅的毒草，许多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被打成“黑帮”。林彪、“四人帮”表面上高喊“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把鲁迅当作“神”，每搞一次批判运动就选学鲁迅的一些文章、“语录”，实际上是把鲁迅拴上他们篡党夺权的战车，把鲁迅用为打人的棍子、作为万能的通用棍子伸向各个领域。报刊上虽然发表了许多“学习鲁迅”和分析鲁迅杂文的文章，但绝大多数都是配合当时的“斗批改”而写的，大搞穿凿附会、强求微言大义，歪曲了鲁迅原著的本意。在“文革”的中、后期，“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的御用“鲁迅研究”班子——石一歌撰写的《鲁迅的故事》（1973年初版、1974年修订二版）和《鲁迅传（上册）》（1976），是伪造史料、穿凿附会、严重歪曲鲁迅形象的标本。他们撰写的评法批儒文章，如发表于1974年11月12日《文汇报》上的《研究法家要古为今用》一文，全部论点无不贴上鲁迅的标签，但实际是句句穿凿附会，全是谎言，其目的就是企图利用鲁迅来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服务。

但是这时期的鲁迅研究也还有一些收获，即围绕《鲁迅全集》的重新注释，发现了鲁迅的一批佚文，也发掘和核实了不少有关鲁迅生平的史料。另外，也有些研究者默默地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为后来的鲁迅研究打好了基础。

（六）鲁迅研究的新生时期（1977——）

粉碎了“四人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指引下，鲁迅研究迎来了新生时期。主要标志有：

1、鲁迅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后起之秀成批涌现，并且

有了全国性的鲁迅研究学会和鲁迅研究专门杂志。

2、出现了许多有质量、有独创性的学术专著和专题论文。光是1981年全国就发表了三千多篇论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如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林志浩的《鲁迅传》、林非的《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张琢的《鲁迅哲学思想研究》、马良春的《鲁迅思想研究》、陈鸣树的《鲁迅小说论稿》、孙玉石的《〈野草〉研究》等等都是恢宏大作。

3、鲁迅研究的禁区被打破了。鲁迅的伦理观、“立人”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和“国民性”论等等，都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获得了相当可喜的成果。

4、重视综合性研究，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进行研究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在这方面，王瑶、王富仁、林兴宅、孙昌熙、刘柏青、许怀中等都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5、出现了对鲁迅研究之研究。袁良骏、陈金淦、朱文华等都写出了有相当份量的论著。

6、港、台和国外鲁迅研究已经引起了我们重视，调查和翻译工作正在进行。

二、鲁迅研究的历史经验

从上面关于我国鲁迅研究历史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到这个学术研究领域六、七十年来从未平静过，充满了风风雨雨，这里有宝贵而丰富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其一，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搞好鲁迅研究的关键。鲁迅说过：“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致韦素园》1928年7月22日）鲁迅后期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我们要搞好鲁迅研究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这是六、七十年的鲁迅研究历史所证明了的。鲁迅研究草创时期，张定璜的《鲁迅先生》是比较有份量的论文，但他的三个“冷静”之所以流于表面和片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运用的武器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然而不久茅盾就写出了本时期的压卷之作《鲁迅论》，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茅盾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鲁迅，决不能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必须注意理论和实际结合，记取鲁迅研究在1928年的短暂迂回期和“文革”十年中挫折期的教训。此外，要特别指出的，我们今天研究鲁迅除了鲁迅和鲁迅著作是极为复杂的这个原因之外，也还由于六、七十年来鲁迅研究过程中真理与谬误杂陈，以错误的东西来说，有些是出于研究者的思想局限（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创造社、太阳社攻击鲁迅的文章），有些则纯粹出于国内外敌人的攻击诬蔑。错误的东西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我们要正确吸取过去和现在鲁迅研究者的有益营养，抛弃其糟粕和杂质，也必须首先学好马克思主义。

其二，准确、全面地理解鲁迅著作和掌握各方面有关资料，是搞好鲁迅研究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是马克思毕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经验的总结。科学研究工作占有的材料愈充分，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愈坚实和牢靠。我们研究鲁迅的第一步工作就必须全面阅读鲁迅著作以及与鲁迅有关的各种资料（包括亲友回忆录、社会历史、所受古今中外作家的影

响、后人的研究成果、等等)。这是非经长期的持久的用功不可的。同时,光阅读过和搜集到了并不等于占有,要占有还必须有准确、全面的理解。例如鲁迅小说《药》的主题,过去有人认为是反对迷信,这就显然理解太片面;有人认为是表现封建社会吃人,这也显然概括太笼统。要怎样才能做到准确、全面地理解它呢?根本的方法,还是要遵照鲁迅所说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具体到分析《药》的主题思想,首先要把《药》的字、词、段意和全篇的线索结构弄清楚,其次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有关《药》的创作意图的论述,综合起来,仔细思考,最后我们就会认识到:《药》彻底地暴露了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迷信毒害下中国广大群众的愚昧,深刻地表现了辛亥革命烈士为群众利益牺牲而不被群众理解的悲哀,启示人们革命首先必须注意唤醒和发动群众,这才是拯救华夏(中国)的良药。

其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学习新的理论和方法,是鲁迅研究取得新的突破的途径。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一贯提倡史家要才、学、识并重。刘知几的所谓“才”,实际就是指方法论。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才),才能驾驭材料(学),最后才能提出新的创见(识)。六、七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历史也同样证明这点,象李长之的学识不能说不渊博,孙伏园对鲁迅不能说不熟悉;但由于李长之用的是唯心论的思想武器,他写的《鲁迅批判》错误很多,孙伏园解释《我的失恋》时由于采用的是“索引派”的方法,对猫头鹰等代表的是什么,可以说一无是处。鲁迅研究史告诉我们:只有当人们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